

红楼易学掀谈

王宪明 著

薛宝琴立雪赏梅

疏影横斜是花，春融兒女說香子，同是面樞兼余賞。

疏影金山雪落霞，幽夢冷隨紅袖夢，滿山香泛落河橋。

前身定是瑶台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易学摭谈/王宪明编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11

(北方文丛/李增坡 邹金祥主编)

ISBN 7-5034-1212-7

I. 红… II. 王… III. 文论—中国—当代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 096997 号

书 名:	红楼易学摭谈
编 著:	王宪明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2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12-7/G·0418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引言：心·易·史·《红楼梦》	1
为天平闲人一辩	16
雪芹易学家传	19
言有伦序	25
“大旨言情”	31
真事隐去	37
宝琴立法	43
阴阳顺逆	60
中秋节目	63
宝鉴正反	68
麒麟祥异	79
祸福观念	82
中庸与乡愿	92
龄官画蔷	103
小小王家	111
成窑盖钟	114
“母蝗虫”	117
硕果不食	120
贾政存周	124
日月为明	129
通乎昼夜	133
巧姐磨难	136
凤姐善恶	140

“梅鹿皮一方”	147
婉嫔四娘	154
正邪两赋	158
“天然”与“人力”	165
“大观”释义	170
大观园图	173
正朔研究	175
黛玉伤春	187
方位研究	192
服色研究	201
那山那狗	212
悲喜交集	216

引言：心·易·史·红楼梦

—

据《红楼梦》第一回，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本来是刻在女娲补天、炼而未用的顽石上一段石头自述幻形入世的故事，后来这块石头变成通灵宝玉，由贾宝玉诞生时带出娘胎。但上面只有二十四个字：“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

通灵宝玉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命根子”，也是我们进入这座千古迷宫的锁钥指南，通灵宝玉上的那二十四个字，实为全书之提纲挈领。晚清以易理解《红楼梦》的太平闲人在其《妙复轩评石头记》中，反复提醒读者，通灵宝玉“演人心”。这个“心”字，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有万钧之重。

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心的文化”。心性之学，是道教哲学和禅宗学说的基础，也是宋以后儒学的核心内容。封建社会后期三教日趋调和，也正是以心性之学为桥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互为取给。当然三教也有“共享”的文化资源，儒教以《易》为诸经之首，而贾宝玉常读的《周易参同契》，既为道教“丹经之祖”，也被禅宗用来作为阐述佛法的重要工具。太平闲人以为《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乃作者“借径二氏，以演儒学”^①，其说自有渊源。

蒙王府本《石头记》十二回回末总评曰：“儒家正心，道者炼心，释辈戒心。可见此心无有不到，无不能入者，独畏其入于

^① 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第一回。

邪而不反，故用正炼戒以缚之。请看贾瑞一起念，及至于死，专诚不二，虽经两次警教，毫无反悔，可谓痴子，可谓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独欲思，岂逃倾颓？作者以此作一新样情理，以助解者生笑，以为痴者设以棒喝耳！”如此则《红楼梦》之“借径二氏”，也可以解释为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借道、释之“炼心”、“戒心”，辅助儒家之“正心”，以宗教之超越精神，提升儒家之人文世俗精神，“补王化所未及”，此亦《周易》之“神道设教”的功用。

二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史湘云与婢女翠缕论阴阳，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童蒙的翠缕在史湘云的开导下，也明白了“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所谓“从古至今，开天辟地”，实际上是说历史。

庄子“《易》以道阴阳”之语，最为人乐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而史学与易学关系最密切。“六经皆史”而《易》为其首。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是《易》的开始，也是历史纪录的开始。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虽然学术界关于“史”字本义的解释为轩为轻，但这种说法还是较为通达的，也能说明“史”与“易”的关系。

古代统治者每遇重要事情，如祭祀、战争、婚姻、狩猎、生病甚至做梦，都要占卜、咨询，卜中则行之。《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从现在发现的商代十五万片甲骨来看，当时几乎每日必卜，甚至一日数卜。占卜运用易理，夏为《连山》，殷为《归藏》，周则《周易》，此皆卜筮之书，亦是遵照一定宗旨整理的卜筮之史。而每次占卜之后，占卜的内容及有关吉凶休咎

和卜后的应验（卜辞），被记载下来并刻在甲骨简契上，作为档案保存起来，可以视为历史记载的一种原生形态。安阳小屯村甲骨，其实就是商代的档案馆和图书馆。

在先秦时代，巫、祝、瞽、史常常并称，他们的工作性质大致相同。随着文字的广泛使用，瞽的传史功能日益减退；随着人类认识到天道远而人道迩，神道巫术也日渐淡出统治决策（当然，直到今天仍未完全退出）。而后世太史之职，除“记言”、“记行”，“书法不隐”外，仍兼有巫、祝、瞽的特点。《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史太君与两个女先儿（瞎子、瞽）说史“掰谎”，褒贬扬抑，仍有其余绪。

史官周旋天人，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总结损益否泰盛衰消长之规律，穷神知变，对现在的洞察，对未来的预见，较一般人要深刻准确（当然这种深刻和准确往往被有意神秘主义化了）；所提出的决策、建议，也都能协和中庸，令人“寡过”，具有可操作性。周谷城先生曾说：“史官主贞卜，保图籍，备咨询，在部落首长前，实为一最亲密的而重要之人。”^①但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还有统治者对史官矫言祸福的防范，史官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甚至等之倡优。《红楼梦》中的“文官”等十二戏子，有影射明史馆博学鸿词的地方。而历史本身，常常假语存而真事隐，成了任统治者打扮的小姑娘，难得“中正”了。中国的历史，虽然不是每页都写着“吃人”，但却充满强者为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因果循环，道德和正义的呼声非常微弱，后世入纵然掌上千秋史，却往往正照宝鉴，所学者非治平天下的正道，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权术。易学作为工具，也沦为为阴谋术数，甚至江湖上的狗皮膏药。

明白了易和史的这种渊源关系，我们就对古人以史证易（如

^① 周谷城《中国政治史》第57页，中华书局，1982年。

李光、杨万里、章炳麟)，以易解史（如黄道周、王夫之），即易求史（如章学诚、刘师培、顾颉刚），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明末黄道周《易象正》、《三易洞玑》以天象历数阐讲《易》理，艰深奥衍，即使《易》学界也很少有人涉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黄道周传记载他于崇祯五年上疏云：

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黄道周之言，在有些人看来未免夸口，却自有根据。近代易学大师杭辛斋《读易杂识·历数卦气》中一段文字，可与此发明：“吾国历数之精，不但合日月行度之数，并合天地阴阳之气，而人物之生于天地之间者，其荣枯得失，亦莫不与此气与数相合。”《红楼梦》人物命名（特别是四春），季节风物，炎凉荣辱的描写，亦通于此理。如果现代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也了解这些渊源，他可能就不会主张“严禁阴历”了^①。

三

《红楼梦》的通灵宝玉，最初是女娲补天未用之五彩石，而小说第一回介绍全书成始成终的甄士隐出场，说“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云云。小说第十二回说“风月宝鉴”（其实就是说本书）“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这令人联想起北宋“以《易》为宗”，“学贵心悟”的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

^① 俞平伯《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人生不过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② 《张载集·近思录拾遗》。

为何要为天地立心呢？是因为天地“无心”，是因为天地有缺陷（即《中庸》所谓“憾”）。张载《横渠易说》卷三届《系辞上》之“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一句，首引《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教父海德格尔最感兴趣的）。天地化育养成万物，无论东西方，人们都对天地怀有崇敬、感恩的态度。但大自然也充满着毁灭、破坏，充满着偶然性。无论是化育养成，还是毁灭破坏，在天地都是无心为之。所谓为天地立心，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服务之意。人是天地的产物，“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①。而人类历史与自然史密不可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对于“天道远而人道迩”的中国古人来说，所谓历史主要是人类历史。《红楼梦》“补天”，其实是为中华民族斡旋气运。

宋张浚《紫岩易传》卷七：“天地自然之道所以运转今古，育成万物者，备于易，发于圣人之心。圣人心法之妙，与天地通一之，所该万无不举，故天地造化之几，赖以财成而成位乎上下。圣人有补于天地至大，其道神矣。呜呼，易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圣人先得之以著见于易，然则易者圣人之心也。天地之心即易之心，易之心即圣人之心，曰准曰相似犹为强名辞耳，以心观之，吾又安知孰为天地，孰为易，孰为圣人也哉！学者当反求诸心，以极夫虚静之道。心光所烛，理自不昧。用之于身，用之天下，固无所往而不宜也，可不勉邪？”

张载又有“人本无心，因物为心”^②之说，很多研究者以为这反映了作者客观事物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倾向，其实过于牵强。如果把这两句话换成“人心本空，因物而有”或不谬于张子。把人心比为一个电脑硬盘，当信息未输入时，与此硬盘皆归空寂，

① 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

② 《张子全书》卷12《语录》。

当信息输入之后，信息被编码储存，可以随时加工利用，此信息便不在硬盘之外。张载同时又说：“以闻见为心，则不足以尽心。”人的大脑不仅被动的、机械的接受信息，还能对信息进行甄别、分析，总结出各种规律，引申出各种价值。《红楼梦》第一回写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由色悟空”其实可与《易》之“得意忘象”相发明。

人类所有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都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人要参与生活、改造社会，必先认识社会。所以《大学》八事，始于格物致知。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也是强调记忆的重要。当然，儒家的格物致知，既重视客观的“真”，更重视主观的“善”，所谓“义”、“理”、“道”，都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只是一般人由于根性迟钝、意志薄弱或欲望蒙蔽，难以执著于这些价值。《老子》的“天地不仁”与伪《古文尚书》“人心唯危”相发明（《红楼梦》中说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正是唯危）。天地有缺陷，需要圣人为之立心；人心有缺陷，须圣人为之立命（或立道）。这都会影响社会，影响历史，所以能为“万世开太平”。《红楼梦》通灵宝玉反面“一除邪岁，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正是这个意思。

通灵宝玉上“仙寿恒昌”这句话，令我联想起《老子》“死而不亡者曰寿”，宋遗民郑所南《心史·久久书》“身可杀，心不可杀；形可泯，理不可泯”，还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宗祠衍圣公书、太平先人以为表示作者“自信其书必传永久”的一幅楹联——“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一个人如果能上下其察，具备万物，陶溶古今，坚持真理，捍卫正义，遏制邪恶，拨乱反正，参赞化育，斡旋气运，造福生民，他的生命就会超越个人、家庭、阶级乃至民族局限，走进永

恒的行列。

四

无论哪一派红学家，都不否定《红楼梦》对《春秋》的师法继承。只是曹雪芹所师法的不仅有属辞褒贬的细节，还有孔子补天济民，为万世开太平的深心大义。

当然，春秋和清代时势有异，仁人志士的使命也便不同。《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红楼梦》因“夷狄猾夏”而作；《春秋》重在强干弱枝，而《红楼梦》重在尊华攘夷——当然，两者都有历史进化观，都以《中庸》为归依，都指向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大同世界。这也是《周易》“与时偕行”，“一致百虑”的表现。

《春秋》为诸史之宗，同时又是“赞《易》”的孔子所修，所以更能与《易》理相发明，都是通变寡过之书，都是“为君子谋”之书。

古人常以“天崩地陷”或“天崩地解”喻帝王去世或改朝换代。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二《留别海昌同学序》“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即感慨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不能拯救明朝灭亡。《红楼梦》第一回莫名其妙的“地陷东南”，其实亦寓明朝灭亡。至于“补天”云云，则是恢复中华正统，为后世开太平。俞平伯先生在1986年所作《旧时月色》一文中评《好了歌》，指出：“展眼兴亡，一明一灭，正在明、清交替之间，文意甚明。”^①这已和蔡元培索隐派，距离很近了。

作《易》、《春秋》、《红楼梦》者，皆有忧患，皆写忧患，皆欲去忧患而致太平。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礼，乃书于策，使正其心术，

^① 《俞平伯论红楼梦》页113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正由于人们“败常反礼”，社会失范（如明末自上而下的道德灾变），才造成了社会的危机和动乱，生民涂炭。

“常事不书”，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桓公四年春。《红楼梦》借事明义，亦与公羊《春秋》相通，皆本《周易》立象尽意之法，不必遵守传信传疑、直书无隐的史官准则。《周易》中龙潜狐济、格帝享王，与《红楼梦》中衔玉诞生，太虚观测等怪诞诡奇的超自然意象、情节，皆不劳史太君“掰谎”。《红楼梦》中成始成终的两个人物甄士隐与贾雨村，既影射满清史狱，同时也有《周易》、《春秋》立象尽意和借事明义的心法真传。《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胡适、周汝昌等“自叙传”派红学家，宝玉必雪芹，贾府必曹府，执相而求，胶柱鼓瑟，变昂扬千里驹为局促下驴，难免为古人所笑。

史湘云与翠缕论阴阳易道未毕，就在蔷薇花下拾到贾宝玉丢失的“赤金点翠”、“文采辉煌”的金麒麟。麒麟乃史外传心的《春秋》的象征，蔷薇又名“四季花”，“月月红”，亦隐“春秋”二字，同时隐炎德汉统。甚至翠缕之名，亦寓虽夷狄猾夏，沧海横流，邪说横行，而人心不死，斯文在兹，正统在兹，不绝如缕。

近代朝鲜学者郑乔先生著《南明纲目》，其自序云：“《大易》扶阳而抑阴，《春秋》尊华而攘夷。以为阴胜阳刚则天道衰，夷乱华夏则人道灭矣。呜呼！环顾今日之宇宙，可谓十月之纯阴，而爱新觉罗氏以女真之遗种，窃据支那之全幅，冠履倒置，腥秽弥漫，殆三百年所，而上九之硕果，则我东土礼乐文物惟在焉！……要之闽浙之朝廷暮徙，九月之阳也；滇黔以后，则十月之阳也。支那七日之复，抑亦有其日矣。”

我读此文，有点像《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众人听了薛宝琴念一个大长今式真真国女儿“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的诗：

“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五

明亡朝灭亡以后，知识界追究乱亡之由，有归之学术者。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拨乱反正，亦以“明学术，正人心”为第一要务。宋明理学于是成了众矢之的。程朱与陆王，虽门径有异，但在顾炎武眼里，都接近“禅学”：

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夫学程子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则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①

《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十九回借袭人之口述宝玉说“‘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所谓“杜撰”、所谓“混编纂”，可能就是指顾炎武所说的“语录”之类的东西。《明史·儒林传》序既言“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自然杜撰的、臆说的、“六经注我”的著作，也就“太多”了。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在荣国府实行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探春，批评朱子《不自弃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也被红学界大头翁们视为反理学的重要证据，但相对于清儒对程朱陆王的批评，这不过是毛毛雨。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

^① 《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

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颜元是清儒中对宋明心性之学批评最严厉的，他在指责朱熹“自欺欺世”，“把人引上歧途”，甚至说朱子是金元之功臣，其学为“杀人”之学：“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①他嘲笑宋代以后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为极上品矣！”^②“习于纸墨浮文，……世道人心全坏于此”^③。看来要端正世道人心，继孔孟之绝学，首先要批判程朱陆王。

清儒批判空谈性理，重考证，倡实践，但并不等于不谈心性。毋宁说他们换了角度谈心性——清儒把心思更多的用在了史学方面，而历史不过是“心”的记忆。

顾炎武说：“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④而其正人心，致太平的主要功夫，则是“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都涉及史学。

① 颜元《朱子语类评》。

② 颜元《存学编》卷一。

③ 颜元《四书正误》卷三。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

斥王阳明为“诬圣之邪说”^①的王夫之，其史论杰作《读通鉴论·叙论四》云：“治之所资，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他在《宋论》卷二又将“传信史”与“正人心”相提并论。

作为王阳明同乡后学，黄宗羲没有直接批判王氏，但他穷经博史，经世务实，与顾炎武、王夫之接近。他在甬上创办证人书院的宗旨就是：“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②他在《补历代史表序》中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③《清史稿》卷四八〇《儒林一·黄宗羲》述黄氏治学宗旨：“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黄宗羲所谓“俗学”，其实主要指王学末流。章学诚称黄宗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④，这才是善学王阳明者。而一代鉅典《明史》主要出于黄学弟子之手（虽然后来被掉包篡改）。

清初三大儒也都深于易学，都有这方面专门著述，他们甚至将易学思想贯穿于史论之中，与顾炎武所批判的援老庄说易的空谈大师、一代易宗王衍有异，以至于《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与翠缕论阴阳，都能天地古今，广喻博涉。

当然，易学、心学，对史学的影响，不仅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谶纬迷信、宿命先验、天人感应等“唯心”史观，常与易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② 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③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校注》本卷五《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94年。

学纠缠在一起。《红楼梦》中很多梦幻预言超自然的情节，与此有渊源。但正如《文心雕龙·正纬》所说，这类东西“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学创作不是新闻记者的记录，也不是杨振宁的科学启蒙，她从来不拒绝幻想和想象。用今天的文艺理论术语说，这叫浪漫主义。

六

俞平伯先生发表于1925年1月16日《现代评论》周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是最早、最深刻、最全面的反思、批判所谓“自叙传”说的文章。文中反复强调：“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着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着一篇科学的论文。”文中他还自拟了三个问题作为“入学考试”，诘难所谓新红学家：

(1) 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

(2) 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

(3) 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那里？能指出否？

俞平伯先生说：“这种难题，若当我正写《红楼梦辨》时拿来考我，必要曳白的。现在，可不不然了。”他是这样“条对”的：

(1) 书中每写到宝玉，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非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

(2) 描写元春归省的排场气派，是从南巡驻蹕曹府中得来的提示。但既没有把某影射某；故贾家的有妃子，无碍于

曹家的没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龙袍的皇帝换上穿凤裙的妃子，这是作者的游戏三昧，腐儒何得而议之！

(3) 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作此愚问，“究竟它在那里呢？”，则必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

俞平伯先生的这些解释，虽然没有指出这三个对象的象征寓意，他也自谦是“滑头伎俩”，但基本上符合文学创作规律，也与《周易》“立象尽意”相通。遗憾的是，俞老先生本人没有由此推广扩充，他的徒子徒孙，更没有一个人尝试回答这三个问题，都采取了正宗的鸵鸟、滑头战术。当然，为了不被漫画成“道学家”，“无中有的热昏的胡话”，二十世纪的红学家也很少敢于用易理去解释《红楼梦》。

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营构之象”，至于他“营构”作品的材料，不排除自己直接的生活经验。但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心灵能具备万物，陶融古今；他们还具有神奇的想象、幻想能力。我们应当品味作者“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醉世神功，若以从中离析出某花某草为目的，岂不辜负了作者一番惨淡经营。其实如果曹雪芹“只看到一家一户血泪帐”，拘拘于个人身世之荣辱恩怨，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红楼梦》是唤醒记忆、惩创人心之书。唯人心能感动人心，唯人心能与人心共鸣。唯有伟大的心灵，能觉世牖民，导人于至善。俞平伯代曹雪芹所说的“在我方寸”，真可谓旨哉言乎！

俞平伯所说的“方寸”，毫无疑问是指“心”。古人因为“心”的体积小，而以“方寸”、“方寸地”代称之。《列子·仲尼》：“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徐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此“方寸”